



满都尔图 民族学文集

MANDUERTU
MINZUXUE
WENJI

满都尔图
民族学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都尔图民族学文集 / 满都尔图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

ISBN 7—105—07957—6

I. 满... II. 满... III. 民族学—文集 IV. 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21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2.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满都尔图,1934年10月生,达斡尔族,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研究室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参加《萨满教研究》、《中国民族学五十年》等多部专著的编写,发表《论父系家庭公社》、《试论商品交换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等论文数十篇。

卷 首 语

自 1956 年 10 月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起至今已整五十年了。回顾其间的经历，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自 1956 年起至 1987 年，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我曾设计若干专题逐一研究探讨，想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晚期形态的著作，但由于研究任务的转向上述计划搁浅，只完成数篇相关的文章。其二，1986 年底我应邀参加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负责主编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满六个民族卷，为此我曾到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省区实地调查，此项任务尚未最终完成，研究领域又有新的变动。其三，自 1992 年下半年起我的研究重点又转向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现状为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参与朝鲜族、黎族的调查和最终成果的撰写，负责审定蒙古、维吾尔、藏等 11 个民族卷。本文集收入的各篇，正是以上三个领域的文章。

科学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要求每项成果都要有新的材料或新的思想观点，即所说的新意。多年来我始终以新材料或新观点作为写作学术文章的基本要求，每篇文章总应有自己的东西，总应该有点棱角。但限于水平，成效甚微。今天看来文集中



的有些观点（如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未必全面，但为了保持当年文章的原貌，收入本文集时未作改动。文集各篇文章中的是与非、得与失，只有读者去评说了。

满都尔图

2006年8月于北京芙蓉里

目 录

中国民族学的黄金时代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1)

学习 继承 探索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发表一百周年 (16)

论父系家庭公社 (34)

论农村公社 (50)

试论商品交换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 (68)

家长奴隶制探析 (86)

鄂温克人的“乌力楞”公社..... (105)

从家庭公社到地域公社

——鄂伦春族原始生产方式的解体..... (122)

略论达斡尔族的氏族制度..... (136)

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 (150)



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回忆.....	(183)
中国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	
社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202)
经济改革与中国少数民族.....	(219)
白沙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前景的探索.....	(226)
原始宗教与氏族制度.....	(244)
萨满教研究的十年.....	(260)
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	(278)
达斡尔族萨满教述略.....	(299)
博穆博果尔与巴尔达齐.....	(308)
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	
——郭道甫生平述略.....	(318)
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	(326)
附录 满都尔图学术简历.....	(335)

中国民族学的黄金时代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1978年，对于中国民族学界来讲，是值得纪念和欢呼的年月。1978年3月召开的科学大会，重新确认了科学技术和科研工作者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地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后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以往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民族学，与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确认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同年12月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更是为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民族学工作者以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奋发图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不愧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二十年的回顾

民族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20 世纪 20 年代民族学传入我国后，老一辈的民族学工作者为我国民族学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适应于制定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在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民族学工作者相继进行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推出了相应的成果，为了解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族情，为推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 60 年代中期以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学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制约，甚至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其研究业务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和压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危难中的中国民族学带来了新生。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学经历了如下三个相继发展的阶段。以 1979 年中国民族学学会筹备会的成立和 1980 年 10 月举行的第一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及中国民族学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中断多年的我国民族学开始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学以研究探讨民族学的定义、任务、研究对象和方法为主题展开讨论，在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等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从而为中国民族学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学科理论基础。第二阶段，自 1982 年起以组织编写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研究丛书为标志，进入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调查研究阶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鄂伦春、部分鄂温克和赫哲等族从事渔猎生产，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和部分藏族则以畜牧业为主；云贵川等山区的少数民族则以山地农业为主，其中不少地区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从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独龙、怒、傈僳、景颇、佤、拉祜、基诺等十多个民族处在原始社会末



期或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凉山地区彝族处在奴隶社会的晚期发展阶段；西藏及川青地区的藏族和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则处在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从他们的宗教信仰看，东北和西南山区不少民族信仰原始宗教，西北地区多数兄弟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和蒙古等民族中盛行藏传佛教，形成多种宗教同时并存的局面。对于这些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只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以往各种条条框框的环境下才得以顺利发展。1986年12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以“我国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为议题召开的工作座谈会，标志着我国民族学继续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将调研工作转向以研究现实问题为核心的新阶段。从中央到各地民族学工作者适应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自1978年以来的20年间，中国民族学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田野调查 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是民族学的基础工作。自70年代以来的20年间，自中央到各地民族学工作者开展了西藏东南部地区门巴族、珞巴族和贵州省六山六水地区^①、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区、四川省雅砻江下游及川西北地区有关民族的综合调查，以及对有关民族原始宗教的专题调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专题调查研究，已完成最终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已完成前期工作，正陆续推出最终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

^① 贵州省六山六水地区指乌蒙山、云雾山、雷公山、武陵山、大小麻山、月亮山和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沅阳河流域地区。其面积占贵州全省面积的80%，是苗、布依、侗、水、彝等族的聚居区。

——主要科研成果 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民族学完成的科研成果，无论其数量和质量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 本，三千余万字，开创了注重资料积累，加强学科建设的先例。在这 20 年间出版的民族学著作有《民族学概论》、《民族学通论》、《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义民族学》、《中国民族学史》（上册）等民族学基础理论专著；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专著有《原始社会史》、《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等；关于婚姻家庭和原始宗教等方面的专著有《共夫制和共妻制》、《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神判》和《萨满教研究》、《满族萨满教研究》、《中国图腾文化》等多种。与此同时发表了大量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论文。在这 20 年间我国民族学界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及其成果占有显著地位，出版发表了大量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摄制了一批反映有关民族传统文化和现状的影视片；翻译出版了摩尔根、弗雷泽、科瓦列夫斯基、托卡列夫、勃罗姆列依等国外民族学家的代表作。

以上调研成果的意义在于，为我国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依据和有价值的资料；为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史，提供了新的例证和有益的见解。

——科研机构和队伍建设 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设立民族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外，近 20 个省和自治区建立了民族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其研究业务多侧重于民族学专业。1980 年 10 月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建立，为协调和推动中国民族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民族



学学会成立以来组织召开了五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和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召开了五次工作座谈会或学术座谈会；与中南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学院合作举办两期民族学讲习班，为民族学在我国恢复初期专业队伍的建设发挥了作用。中国民族学学会下属的民族分会和影视人类学分会的建立，为拓展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领域打开了新的局面。目前我国已有数十种刊物设有民族学专栏，为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了学术园地。我国民族学工作者由 80 年代初的二百余人扩大到近千人。为培养民族学专业人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作出了贡献，有关部门也陆续派出青年民族学工作者到国外深造。如今我国民族学队伍中硕士、博士的数量不断增多，标志着我国民族学队伍的壮大和专业素质的提高。

——增进了国际交流 随着我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民族学界冲破以往的封闭状态，不少民族学家出国进行学术访问、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访问或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1989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邀请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学者参加，促进了中外民族学界的学术交流，为我国民族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术环境。

二、成就的由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 20 年间我国民族学所走过的道路及其



取得的成就，无不与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的路线联系在一起的。

1.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自 50 年代中后期相继开展的“反右”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使我国民族学研究不得不走上片面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和歌颂“三面红旗”（即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歧途。1956 年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依据中央的指示所确定的方针是在四至七年内完成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全面调查，首先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做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完整的调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总体方针，自 1956 年下半年起开展的调查工作正是遵照这一方针进行的。但时过仅仅两年，这一方针被政治运动所打乱，当年开展工作的八个调查组中一个组的组长被错划为右派，继任的组长在突出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反调查，搞出了违背当地社会实际、起码的数据都自相矛盾的调查报告。在四川省凉山彝族奴隶制和西藏封建农奴制的调查研究中更是出现了夸大当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偏向。自 1958 年以来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中国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无一不以“厚今薄古”，歌颂“三面红旗”为宗旨。80 年代初以来，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组织出版的各民族简史和调查报告，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伪存真，对已有的原稿做重大修改或重新改写，纠正了以往在民族学研究中盛行一时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

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思想原则，对我国民族学界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著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民族学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这是难得的。但在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逐渐盛行的年代，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具体论点和个别词句当作教条，贴标签式的引入自己的著作、作为立论依据的现象屡见不鲜。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一个“完整”、一个“准确”、一个“科学体系”的指导思想，引导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同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著作的科学体系，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是我国民族学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被我国民族学界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著作，成为民族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为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起源》毕竟写于百余年前，限于当年客观条件的限制，该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更何况当年的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而在其著作中难免有阶级的倾向性。例如作者在《起源》中通过原始时代氏族酋长与阶级社会中一个警察的对比，对原始酋长的赞叹即是一例。1984年，是《起源》发表一百周年。中国民族学学会以纪念《起源》发表一百周年为中心议题，召开第三届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和这次会议前后，我国民族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充分肯定《起源》对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填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原始社会史和国家起源理论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以及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所起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依据近百年来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提供的新资料，对《起源》的某些结论和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分期问题 恩格斯在《起源》中采纳摩尔根以生产力方面的发现或发明为标志，把原始社会分为蒙

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每个时代又分为低、中、高级三个阶段。我国学者认为划分原始社会的阶段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力的因素，而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及社会的演进为依据。究竟原始社会如何分期，我国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三段论、四段论、五段论和六段论等不同的观点。^①

——关于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问题 恩格斯在《起源》中说：“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可以了。依据我国的民族学资料，从母系到父系的变革不仅是自然发生的，而且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过程，所谓双系家庭，就是这种长期性和反复性的产物。在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根本不存在做出改变世系，从而引起社会重大变革的机关。有趣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持云南省党政工作的某负责人签发禁止该省永宁地区纳西族实行“阿注”婚和维系母系家庭的强令性文件，遭到当地群众的抵制，最终不得不作为一纸空文而作废。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同时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裂的问题 恩格斯在《起源》中论定“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诚然，畜牧业的兴起创造了远比狩猎业更为丰富的财富来源，但由此推断出畜牧业一兴起就必然要和奴隶相伴随在一起，是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的。畜牧业的形成，是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公有制在当时依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与奴隶劳动等社会现象相隔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① 参见时佑平：《原始社会史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陈国强：《关于人类起源及原始社会史的分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4）；林耀华：《原始社会史·导论》，北京，中华书局，1984；秋浦、李清和：《关于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载《思想战线》，1984（4～5）；杨堃：《试论原始社会史分期问题》，载《思想战线》，1982（5）。



——关于父系家庭公社的性质问题 恩格斯在《起源》中认为父系家庭公社是“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我国学者认为这一结论未必确切。保留在我国鄂伦春、鄂温克和独龙等族中的父系家庭公社，一没有奴隶，二没有父权，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共同劳动、平均分享产品为特征的原始共产制大家庭，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基层组织形式。其实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中补充的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公社的性质，亦属于原始共产制类型，只是恩格斯没有作出更为确切的结论而已。^①

引述以上实例，在于说明在三中全会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民族学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从事本专业调查研究的一个侧面。

2. 冲破“禁区”，拓宽研究领域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初期，在首先调查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同时，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的历史作系统研究的方针指导下，各调查组对有关民族具有特色的婚姻家庭、原始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进行了调查。然而在“反右”斗争和“拔白旗”运动中，这些工作被斥责为“猎取奇风异俗”，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流毒而被批判，被列为不得越入的“禁区”。其中普遍遗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更是被认定为“封建迷信”，属应取缔之列，成为“禁区”之重要领域。

我国少数民族中遗留下来的原始宗教，如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信仰的萨满教，云南省彝族的毕摩，甘青川藏广大地区藏族

① 以上关于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过渡、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大分裂、父系家庭公社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参见满都尔图《学习 继承 探索——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载《民族研究》，1984（5）。

